airiti

紳士偵探——
談阿庫寧的《新偵探小說》系列

江慧婉*

摘要

1998 年任職《外國文學》雜誌副總編的契哈爾契許維里以阿庫寧為筆名出版《冬日女王》，正式邁入俄羅斯大眾文學市場，不久後便成為家喻戶曉的偵探小說家。迎合蘇聯解體後社會瀰漫的懷舊情結與閱讀大眾對輕小說的喜愛，阿庫寧以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為故事背景，融合高雅文學與低俗小說，為要求嚴格的讀者創作消遣讀物，成功塑造正直、勇敢、行動果決、重視社會道德的警探——方多林：一方面運用後現代互文性的手法，借用經典文學作品的橋段、角色並以歷史人物為本，巧妙地置入偵探小說中，建構文學歷史拼圖，提供讀者腦力激盪的樂趣；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呈現悲慘、腐敗與社會不公的俄羅斯帝國，試圖打破懷舊迷思，對比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與當今俄羅斯，以過去影射現在，從歷史觀點看待似曾相識的問題，揭露自沙皇時代以來一直未能獲得解決之階級差異、種族歧視、恐怖組織等問題。此外，阿庫寧的作品也提醒當代俄國人，擺脫困境有賴成千上萬人的努力——勤奮工作、奉公守法，對國家盡責——人人都可以是方多林。

關鍵詞：大眾文學、阿庫寧、歷史偵探小說、後現代互文文學。

---

* 本文 105 年 9 月 25 日收件；105 年 10 月 16 日審查通過。
江慧婉，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講師

airiti

On Boris Akunin's *Adventures of Erast Fandorin*

Hui-Wan Chiang *

Abstract

In 1998 Grigory Shalvovich Chkhartishvili, the deputy editor of magazine Foreign Literature, with his first detective novel Azazel, which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pseudonym of Boris Akunin, burst onto the Russian literary scene. Soon the protagonist of Adventures of Erast Fandorin became popular and earned the author the reputation of a detective writer for intellectuals. Along with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there arose the cri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merged nostalgia for pre-revolutionary Russia. Making the most of the prevailing nostalgic atmosphere, Akunin successfully created an intelligent, hardworking, fearless, decisive and decent sleuth who values social morals, Fandorin. While uniting the genres of detective fiction with Postmodernist aesthetics, Akunin demonstrated how miserable, corrupted and unequal was the society of "golden age" and criticized the idealization of pre-revolutionary past. Moreover, for contemporary Russians who would like to find a way of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the honest, relying on himself and responsible Fandorin might be the ideal model.

Keywords: popular literature, Akunin, historical detective novels, intertextuality

---

* Received: September 25, 2016; Accepted: October 16, 2016
Hui-Wan Chiang, Lecturer of the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iriti

一、前言

二十與二十一世紀之交俄國人的閱讀興趣產生明顯變化，由於檢查制度廢止及經濟市場化，文學成為商品，科幻、犯罪冒險及言情等大眾文學逐漸受到各社會階層讀者的喜愛，其中尤以偵探小說發展迅速。大眾文學的主流隨著消費者喜好不斷改變快速發展，對偵探小說的體裁有很大影響。偵探小說開始融入驚悚、心理、神秘、冒險和浪漫情愛等元素，諷刺、警世及幽默的犯罪分析更成為偵探小說的特色。儘管許多文學評論家認為偵探小說並非文學，甚至批評其品味低俗、缺乏文化、美學，然而當代俄羅斯偵探小說儼然已成為後蘇聯時期最受歡迎的大眾文學。

正當俄羅斯大眾文學逐漸成形，1998 年阿庫寧(Борис Акунин, 1956-)以令人費解的書名 *Азазель*（《冬日女王》[1]）在俄國文壇異軍突起。不久後他的歷史偵探小說銷售量便超越當時的「偵探小說女王」瑪莉尼娜(Александра Маринина, 1957-)的作品(Baer & Korchagina 2011: 75)，躋身於暢銷作家之列，甚至造成所謂「阿庫寧現象」[2](феномен Акунина)引發熱烈討論。由於系列小說的題材涉及土俄戰爭、革命暗殺、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及「霍登慘案」[3](Ходын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等重大歷史事件，評論家視其作品為歷史小說而非偵探小說，給予兩極評價——有人讚許他對俄羅斯歷史的處理手法，但認為他作品中對歷史的描述與事實有所出入，故意扭曲過去史實者也大有人在：其中或指責他屈從於殘酷的專制政權，創造正面的警探英雄，美化帝國俄羅斯；或批評他塑造一個鄙視

---

[1] *Азазель* 一書曾於 2000 年由遠流出版社出版，書名譯為《墮天使暗殺組》（丘光譯），2013 年櫻桃園文化又以《冬日女王》書名（譯者同為丘光）出版，本文中譯文係根據 2013 年版本略作修正。

[2] 關於「阿庫寧現象」探討詳見：Трофименков, Михаил. “Дело кунина.” *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4 (2000).〈http://www.guelman.ru/slava/nrk/nrk4/37.html〉。此外，2016 年五月在俄國大諾夫哥羅德(Великий Новгород)的市立圖書館甚至舉行名為「阿庫寧現象」的書展，詳見：http://www.biblionika.info/o-nas/branches/balashova/news/item/2410-fenomen-borisa-akunina。

[3] 1896 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加冕儀式當天早上，俄國政府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上安排大規模慶典，結果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擠壓，擠死壓傷群眾高達數千，史稱「霍登慘案」。事故發生後，政府並未取消後續的慶祝活動，整個加冕典禮耗資上億盧布，卻僅花費數萬盧布支付罹難者的撫卹和喪葬費用。

airiti

俄羅斯一切的任性個人；甚或因為作品中屢屢出現對帝俄的負面描述而譴責他有反俄情結，憎恨自己的祖國(Norris 2012: 78)。無論如何，長期以來評論家對大眾文學嗤之以鼻，抱持漠視或負面態度，阿庫寧的創作不僅引起批評討論，且成為文學研究的分析對象，讓他有別於諸多當代大眾文學作家，成為其中的「特例」(Черняк 2007: 194)。

二、從契哈爾契許維里到阿庫寧

學者芭拉邦(Elena Baraban)認為，阿庫寧是諸多後蘇聯偵探小說家[4]中對俄羅斯的現在最不感興趣的一位，也是第一位結合後現代美學與歷史偵探小說風格的當代偵探小說作者(Baraban 2004: 396)。筆名為阿庫寧的格利高里・契哈爾契許維里(Григорий Шалвович Чхартишвили)曾任《外國文學》(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雜誌的副總編輯，為著名文學評論家，精通日語及日本文化，曾翻譯三島由紀夫(1925-1970)、井上靖(1907-1991)、安部公房(1924-1993)等日本作家的作品。阿庫寧是他創作小說和劇本時所用的筆名，有時也以包利索夫娜(Анна Борисовна)或布魯斯尼金(Анатолий Брусникин)等筆名發表作品。契哈爾契許維里曾於 1999 年出版論文《作家與自殺》(Писатель и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從哲學、宗教與心理等各方面探討自殺現象，研究古代至今作家自殺的情況及原因。自稱是「通俗小說作者(беллетрист)而非作家，工作是娛樂讀者」(Мурзина 2000)的阿庫寧於 2007 年受訪時表示，以筆名創作並非行銷策略，而是身為知識份子羞於承認撰寫偵探小說：「畢竟我是個有聲望的人——重要雜誌的副總編、評論家……突然〔寫起〕偵探小說，現在體面的讀者對偵探小說的態度較為溫和，但十年前〔創作偵探小說〕就跟寫色情小說沒有兩樣」(Дашевский 2007)。接受《論據與事實》(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訪問時嚴肅的日本文化研究員契哈爾契許維里表示「我的『阿庫寧』方案既是文學也是商業方案，我希望住在俄羅斯的文學家能賺取足夠金錢，建立一個作家為中心，而不是以出版社、文學經紀人或製作人為中

[4] 當代俄羅斯的知名偵探小說家有創作傳統警察偵探小說的瑪莉尼娜、寫諷刺偵探小說的東佐娃(Дарья Донцова, 1952-)、描繪警察故事的涅茲南斯基(Фридрих Е. Незнанский, 1932-2013)與撰寫冷硬派偵探小說(боевик)的朵岑科(Виктор Н. Доценко, 1946-)及卡芮茨基(Данил А. Корецкий, 1948-)等。

airiti

心的文化結構」(Акунин 2001)。

無疑地文學專業經歷有助於創作，精通俄國與外國文學、歷史、文化、善於文字運用的阿庫寧以獨特的寫作技巧與歷史題材贏得一般讀者及知識分子的青睞。雖然年過四十才開始寫作，卻是一位多產作家：迄今已有十五本以埃拉斯特・方多林(Эраст Фандорин)為主角的《新偵探小說》(*Новый детектив*)系列、三本以修女佩拉吉婭(монахиня Пелагия)為主角的《外省偵探小說》(*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й детектив*)系列及四本以埃拉斯特的孫子尼古拉斯・方多林(Николас Фандорин)為主角的《大師冒險》(*Приключения магистра*)系列等偵探小說，另著有劇本及短篇小說等作品。阿庫寧的系列小說被譯為法文、英文、義大利文、日文等其他外語，改編成電影、電視影集、作為青少年課外讀物的簡易版小說與漫畫等，其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2000 年他更以《加冕典禮》(*Коронация, или Последний из романов*)一書獲頒反布克獎(Антибукер)。

本文探討的方多林系列背景為 19 世紀下半葉的沙皇時代，由兼具機智、勇氣、毅力、外貌和語言天分的年輕警探方多林帶領現代讀者進入俄羅斯帝國末期的動盪社會裡神勇辦案。小說吸引讀者的不只是題材，還有精彩描述的犯罪事件發生時的歷史背景，書中誠懇、純真又勇敢的正面英雄，有別於當代通俗小說的主角更是深受讀者喜愛。滿足不同讀者的品味——無論是單純尋找緊張情節、懷念正面英雄或只是喜愛優質文學，是作品成功因素之一。

三、復古的「新」偵探小說

俄羅斯偵探小說通常著重於揭露兇手的犯案動機，偵探扮演的角色只是判斷個人如何、為何作案與其傷害國家的程度，談不上是解決謎題或保護公民社會，所以偵探通常是警察或是國家機構成員，而不是私家偵探。根據學者歐爾卡特(Anthony Olcott)的看法，「俄羅斯偵探小說(детектив)不是供讀者體驗解決案件喜悅的邏輯猜謎；也不是為歌頌個人英雄主義、主動精神或勇敢行為而寫。自蘇聯時期至今，俄國偵探小說的中心主題在於當社會無法控制所有成員時會對社會造成集體傷害……偵探小說是一齣社會道德劇……不斷證實個人必須服從國家機器……」(Olcott 2001: 45-46)。俄羅斯學者卡佐勒格(Оксана Козорог)認為當代俄羅

airiti

斯偵探小說的特點之一是缺乏古典偵探小說中，從種種蛛絲馬跡抽絲剝繭，在眾多嫌犯中尋找真兇的推理過程(Козорог 2003: 114)，但阿庫寧的作品卻推翻上述觀點。阿庫寧顛覆俄羅斯偵探小說的公式，遵循英國古典偵探小說傳統——兇手犯案，警探方多林進行蒐證調查，最後解決案件。學者卡瑪若娃(Olga Komarova)進一步指出阿庫寧作品具古典偵探小說的四個元素：如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般的聰明神探（即方多林）；華生(Dr. Watson)般的助理同伴——從《阿基里斯之死》(*Смерть Ахиллеса*)開始，日本隨從兼助手馬薩(Maca)一直跟隨方多林，扮演他的華生（不過馬薩無法協助推敲分析案情，只在必要時候採取行動對付罪犯）；沒有血腥的殺人場景、殘暴打鬥；合邏輯優雅的推理(Komarova 2003: 11)。

阿庫寧以十九世紀下半葉作為故事背景，成功區隔當代其他無文學價值的偵探小說，讓人聯想到西方偵探小說發展蓬勃時期的優質作品，畢竟最早的偵探小說出現於「有偉大文學、對進步深信不疑且能優雅有品味解決犯罪案件的年代」[5](Циплаков 2001: 161)。學者韋勒克(Rene Wellek)與華倫(Austin Warren)主張「人從文學作品中獲得的快樂是由新奇與辨識感組成」(Wellek and Warren 1956: 225)，阿庫寧善加運用兩者：其新奇感來自對經典作品互文的溫和諷刺及取材自傳統劇本卻又顛覆讀者的期望，並且以偵探小說的外觀包裝俄國古典文學主題。在綜合高辨識度的文本、熟悉的人物類型與優雅老派的語言，產生溫和的嘲諷卻又讓人感到舒適的對話氛圍，為讀者創造似曾相識的親切環境的同時，卻安排出其不意的結局，作品因而贏得各階層讀者的喜愛。

1. 具後現代色彩的文學拼圖

學者契爾妮娅克(Мария Черняк)指出以文學為中心及後現代遊戲為阿庫寧美學最重要的概念(Черняк 2007: 194)。阿庫寧的小說充滿互文性(Интертекст)——涵蓋俄國及歐洲經典文學作品的場景、主題、角色與風格。如《冬日女王》的開場令人聯想到布爾加科夫(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的《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一八七六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一，這天摻合著春天的清新與夏日

[5] 自 1999 年起，方多林系列小說的封面都印有這句題詞：「紀念有偉大文學、對進步深信不疑且能優雅有品味解決犯罪案件的十九世紀」。

airiti

> 的溫暖，下午兩點至三點之間，亞歷山大花園裡，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了一件荒誕不經的事故。（阿庫寧 2013a: 5）。

此外，《冬日女王》中的主角埃拉斯特與未婚妻麗莎(Лиза)的人物設定來自卡拉姆金(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的經典作品《可憐的麗莎》(*Бедная Лиза*)的男女主角，[6]從方多林與麗莎的對話可以得到印證：

> 我的故事很美妙，只是悲戚的結局頗令人惋惜。這是由於《可憐的麗莎》(*Бедная Лиза*)的緣故。麗莎與埃拉斯特，記得嗎？我想像著；躺在棺材裡的我，美麗而蒼白，滿身擁簇潔白的玫瑰，我不是死於溺水，就是死於肺癆，您泣不成聲……(259-260)

儘管在阿庫寧的小說中，埃拉斯特不再是個靠不住的年輕人，而是前程似錦的有為偵探，麗莎亦非窮苦人家的可憐女兒，而是莫斯科省府高等法院院長的掌上明珠，正當小麗莎「不打算投水自盡，而是出嫁了」(294)，意外的爆炸奪走她的性命，突兀卻符合淒美悲劇的結局，同時滿足讀者對互文的期待——麗莎與埃拉斯特逃不過無法幸福快樂的宿命。此外，許多書中角色也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其原型：斯科別列夫將軍(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кобелев, 1843-1882)、國務總理戈爾恰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рчаков, 1798-1883)、莫斯科暗探局長祖巴托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убатов, 1864-1917)、前後任莫斯科總督多爾戈魯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ндреевич Долгоруков, 1810-1891)與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7-1905)、帝國劇院芭蕾名伶科切辛斯卡婭(Матильда Кшесинская, 1872-1971)、莫斯科警察局長弗拉索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совский, 1842-1899)等。這些人物隱藏在化名之後，如同歷史拼圖供觀察敏銳的讀者享受智力遊戲般的樂趣——隨著方多林找出臥底警察系統的民意黨人、潛伏於俄羅斯軍隊的土耳其間諜……同時猜

---

[6] 學者葛芮斯塔認為雖然埃拉斯特的名字來自《可憐的麗莎》，但 Эраст 的希臘文 Erastos 意為「受喜愛的」，其德文姓氏 Von Dorn 意為「刺、棘」，也就是說，這名受到愛戴的警探，對罪犯而言卻如芒刺在背。詳見：Gresta, Eugenia. “From Moscow to London and Return: Some Perspectives on Boris Akunin’s *Erast Fandorin Series*.” *Toronto Slavic Quarterly*, 55 (winter 2016): 5. Available: http://sites.utoronto.ca/tsq/55/Gresta.pdf

airiti

測這些人的真實身份(Лурье 2000)。

阿庫寧的敘事也展現鮮明的互文性，如首部曲《冬日女王》中方多林的「老大」(шеф)——布里林(Бриллин)教他「演繹法」：

> 您的房東太太……稱呼我『大人閣下』—這是第一點……在我尚未表明身分前，卻對我以『大人閣下』的頭銜相稱——這是第二點。除了格魯申外，我沒對其他任何人說過要拜訪您——這是第三點……」（阿庫寧 2013a: 86）

布里林不斷重複的強調顯然刻意模仿福爾摩斯的推理分析，卻有滑稽的效果。最後冒牌的福爾摩斯竟然是殺害許多當時社會菁英的國際虛無主義組織「阿札澤勒」(Азазель)的重要成員，作者嘲諷地賦予這位「以科學辦案的未來人」（阿庫寧 2013a: 84）和福爾摩斯不相上下的推理能力，進而質疑這種能力的作用。阿庫寧融合高雅與通俗文學，借用經典作品中的橋段，甚至將人物的性格與姓名恣意地移入自己的情節，再輕描淡寫地挖苦諷刺、包裝成通俗的偵探小說，賦予了這些素材嶄新意義。

2. 諷刺的歷史謬誤

評論家批評阿庫寧扭曲史實，但學者哈姬(Sofya Khagi)認為這是作者的有意安排，錯誤的歷史陳述有其諷刺的戲劇效果(Khagi 2005)。例如：《冬日女王》中女男爵艾斯特(баронесса Эстер)為自己組織辯護的發言讓讀者想起二十世紀的歷史：

> 我從事教育四十年，造就了一萬……學子步出社會……您難道沒看到，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我們的世界突然變得更和善、更理智、更美麗嗎？一個真正的世界革命正發生著。而這全然是不可或缺的，否則不公義的社會體制會帶領我們走向另一種流血革命，倘或如此，人類將退步到好幾世紀之前。（阿庫寧 2013a: 268）

又《鑽石馬車》(*Алмазная колесница*)中方多林「發明」了電話竊聽，年輕軍官李西茨基(Лисицкий)讚嘆地說：

airiti

> 真令人吃驚，以前竟然沒人想到。畢竟可以在電話局裡設置一間特別的辦公室，竊聽嫌犯的對話！對祖國有多大的益處！本著科技進步的精神，多麼文明……(Акунин 2003: 19)

《冬日女王》中大學生科科林(Кокорин)因與同學阿赫特爾采夫(Ахтырцев)同時愛慕美麗的交際花貝若茨卡雅(Бежецкая)進行決鬥而死於警察偵查局老警探格魯申(Грушин)口中的「『美利堅輪盤』[7]，是在美國淘金熱時期發明的。左輪槍轉輪裡只填一發子彈……如果走運，就掃清莊家賭注，如果倒楣，就一命嗚呼」(阿庫寧 2013a: 31-32)。對於後世名稱不同作者有其自圓其說的解釋：「由於我倆的行徑，以後這個把戲將會改名為俄羅斯輪盤，你等著瞧吧」(76)；《加冕典禮》中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情節融入讀者熟悉的「霍登慘案」，卻將歷史事件改編為書中的蛇蠍美女為了逃避方多林的追捕所釀成的悲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裝飾師》(*Декоратор*)中倫敦的連續殺人犯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竟然是俄國人，且在犯案時遭方多林槍殺身亡等。在讀者明察秋毫的前提下，這些捏造的歷史具有戲謔效果。

不同於許多後蘇聯現代主義作家表達形而上的否定現實、絕望和悲觀，學者卡瑪若娃認為阿庫寧運用文字遊戲手法讓不同階層的讀者發現文本中的文化弦外之音(Комарова 2001: 74)。對阿庫寧來說，文學是遊戲，目的為娛樂，對象是文字與讀者，在回答讀者的問題時，作家坦率地表示：「和聰明的讀者玩耍無妨，也可以戲弄甚至愚弄他。欺騙是另一回事，欺騙就不行」(Комарова 2001: 73)。他認為俄國人總是視作家為生活導師，「這個存在已久的傳統讓我很不舒服，因為我不想當生活導師，我只想提供娛樂」(Rees 2004)，正如《諜影圍城》(*Турецкий гамбит*)的土耳其間諜安瓦爾(Анвар-эфенди)所說：「文學只是玩具，在正常的國家裡，它不可能具有重大的意義」(阿庫寧 2013b: 284)。阿庫寧巧妙地將歷史移花接木，故事情節緊湊，案件解決俐落，但明眼的讀者能輕易地看出故事純屬虛構，作家幾可亂真的歷史寫作展現為藝術而藝術的樂趣。

---

[7] 應為俄羅斯輪盤(Русская рулетка)，是一種殘忍的賭博遊戲，相傳源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帝國，由監獄的獄卒強迫死刑犯進行的賭博方法，另有一說為決鬥方式之一。

airiti

3. 東西合璧的紳士偵探

方多林系列主角埃拉斯特・方多林的祖先方多(Von Dorn)來自德國，十七世紀來到俄國擔任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的近衛軍，任職於莫斯科警察總局轄下偵查局的十四品文官：

> 〔他〕命運坎坷，十九歲時成了孤兒。不識母親為何人，父親個性急躁，把所有積蓄都投資在不切實際的計畫上，然後就這麼歸西了。他當年在鐵路狂熱的時候大發一筆財，卻在銀行熱的時候破產……老方多林先生是個退休的陸軍中尉，他就是受不了這個打擊一命嗚呼，除了一堆無法兌現的支票，什麼也沒留給獨生子。（阿庫寧 2013a: 9-10）

至於外貌，方多林「真是個漂亮的年輕人，有烏黑的頭髮和湛藍的眼珠，個頭相當高大，皮膚白皙」（阿庫寧 2013a: 12），雪白的衣領與袖扣搭配合身的外套，完美的打扮像是「巴黎時尚雜誌封面走出來」(Акунин 1998b: 1)的男模特兒，除非為了任務喬裝，否則總是戴手套、大禮帽，隨身攜帶藏有銳利刀片的手杖。然而與稚氣外型不符的舉止、倦怠的眼神和灰白鬢髮，讓他略顯滄桑，激起周圍女性如《諜影圍城》中的女主角瓦莉雅(Варя)的好奇與同情。總之，如同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筆下的杜邦(August Dupin)或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的福爾摩斯，方多林天資聰穎、有趣、富男性魅力，但小說中有關埃拉斯特風流韻事的情節只是為了點綴他萬人迷的形象，感情生活並非故事的主軸，畢竟埃拉斯特表明：「我不同意您說，除了愛情，一切都不重要。有比愛情更不可或缺的東西」(Акунин 2000: 72)，所以在系列作品中，方多林始終單身，也不曾因感情失控影響案件調查。

埃拉斯特通曉日本文化、信奉印度教、相信靈魂輪迴且奉行不悖，如同《利維坦號輪船》(*Левиафан*)中郵輪乘客日本皇軍軍官青野(Аоно)的觀察，這位「俄羅斯外交官有深奧的，幾乎是日本人的智慧，方多林先生擁有非歐洲人看透事情的能力，不拘泥於瑣碎小事和技術細節。說到技能，歐洲人是無與倫比的專家，我們亞洲人則具有智慧理解到底為什麼」(Акунин 1998a: 32)。方多林勇敢正直，儘管因經歷未婚妻麗莎在婚禮前

airiti

慘死於爆炸造成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有口吃問題，卻精通數國語言，而且「說外語時方多林完全不會口吃……顯然他的病……口吃是一種心理疾病——不知怎的和以俄語表達有關」(Акунин 2000: 114)。此外，他有個奇怪的特質——雖然「無法……忍受賭博，但是一旦不得不賭的時候，總是十賭十贏」（阿庫寧 2013b: 29），同時還擅長易容、身手矯健、勤練日本武術，因此每每在危急時刻能絕地逢生、成功脫困。

埃拉斯特是一位優秀、有教養、俊美的男性，不同於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筆下的白羅(Hercule Poirot)或福爾摩斯青春永駐，他隨著每本書出現在不同年代，在小說中記取生活經驗不斷改變、逐漸成熟，誠如他在《死亡的情婦》(*Любовница смерти*)中（時年四十五）對自殺俱樂部的成員柯倫賓娜(Коломбина)坦言：「我年輕時會因任何瑣事激動，然而命運經常殘酷地考驗我的靈敏度，現在用什麼也難打動我」(Акунин 2001: 61)，經過時間的洗禮，這位偵探從「太嬌嫩，歷練又少」（阿庫寧 2013a: 10）的年輕人逐步進化為打不倒的中年硬漢。學者索柏列芙(Olga Sobolev)認為方多林具體實踐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精神(Sobolev 2004: 81)：首部曲《冬日女王》中血氣方剛、莽撞的方多林，出於好奇主動爭取案件調查，到了第二部《諜影圍城》不再躁進，變得思慮周延、專注且觀察敏銳，不主動出擊，而暗中觀察、等待委託，直到最後一刻才介入調查。在《加冕典禮》中埃拉斯特已四十歲，飽經世故，溫文儒雅，更添男性魅力。從《阿基里斯之死》中一段哥薩克上尉與方多林的對話可以看出，儘管年事漸長，這名偵探仍一本初衷保有榮譽心、責任感與真誠，忠於俄羅斯、正義，堅持自由、職業道義與自己的道德原則：

> 「方多林，請您保證不會利用您偵探的能力危害祖國……」埃拉斯特•彼得羅維奇沈默一會兒回答：「古克馬索夫(Гукмасов)，我保證不會做出有辱自己名譽的事，我想，這樣就夠了」(Акунин 1998b: 12-13)。

他認為要改變國家應先從改變自己及幫助周圍的人做起，其處世原則為對事不對人，服務的對象是國家而非個人：「我並不是在您手下服務，而是為俄羅斯服務。我不願意參加對俄羅斯而言不但毫無益處，而且可能導致滅亡的戰爭」（阿庫寧 2013b: 56），即使冒著生命危險工作，

airiti

也是自願執行任務。

埃拉斯特是一名出身平凡，在警察局從十四等文官做到五等文官的公僕，淡泊名利，試圖在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與保護可能成為犯罪犧牲品的個人間維持平衡，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以尊重個體及維護每個人的生命為第一要務(Gresta 2016)。在幾次涉及秘密組織對抗世界統治的冒險中埃拉斯特表現得像龐德(James Bond)般神勇，他的價值觀走在時代尖端，例如在《加冕典禮》中與皇室總管談到混亂與規則時，總管鄒金(Зюкин)表示：「世上沒什麼比混亂更可怕，因為混亂時會產生瘋狂，破壞所有規則」(Акунин 2000: 97)，方多林提出他的見解：

> 我早就了解，生活就是混亂，完全沒有秩序，也沒有規則……是，我有規則，但那是我為自己，而不是為全世界臆造出來的規則……就讓世界依自己的方式〔運轉〕，而我照我的作法……阿凡希・斯切潘諾維奇，自己的規則不是要用來整頓全世界，而是試圖以某種方式建立你周遭的空間(97)。

方多林既非時代的典型代表，也不是蘇聯及新俄羅斯偵探小說中委屈的時代邊緣人，阿庫寧為不接受任何意識形態的現代讀者塑造的主角是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但他不是思想家，而是活動家。他看穿外國的陰謀詭計，努力不讓俄羅斯成為東斯拉夫的專制政權(Данилкин 1998)。

4. 翻轉的善惡價值觀

傳統偵探小說結尾總是邪不勝正，壞人受到懲罰，社會恢復原有秩序。然而阿庫寧作品並未彰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信條，儘管方多林是個兼具福爾摩斯的推理才能和詹姆士龐德的超人體力的完美偵探，卻往往沒有好的結局。例如：《冬日女王》中，方多林雖然找出一連串殺人案件的主謀——虛無主義組織「阿札澤勒」領導人英國女男爵艾斯特，但她最後成功脫逃，導致這個組織報復，以他的未婚妻喪命收場；《加冕典禮》中方多林無法讓遭綁架的王子生還，也得不到珂謝妮婭公主(великая княжна Ксения)的芳心，費盡辛苦卻無人感激。有別於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文學中清心寡欲的正面英雄，方多林具有七情六慾，深受

airiti

口吃之苦，不時展現弱點，甚至無法拯救自己心愛的未婚妻(Лугарич 2011: 82)。然而命運多舛的情節安排讓完美偵探成為失敗的超級英雄，使人物刻畫顯得更真實、具人性且有說服力，讓人閱讀時不由自主地神入角色，感受他的經歷產生共鳴，甚至同情。阿庫寧運用這個缺陷讓方多林系列獨樹一格，不落入偵探小說的俗套。

從作家選擇筆名的用意，[8]不難看出他個人對是非善惡的看法，阿庫寧不只一次在受訪時表示，經常透過書中歹徒的口中傳達自己的信念(Gresta 2016: 6)。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十分清楚，儘管妄想掌控世界的女男爵和意欲貫徹自我價值觀的土耳其間諜的手段極端激烈，但他們對未來有正確的見解，在《五品文官》(*Статский советник*)中，1891 年的俄羅斯社會因革命恐怖份子而動盪不安，自認身負重任協助無助統治者，拯救俄國免於反抗軍叛亂的波若爾斯基王子(Пожарский)的一席話猶如一記警鐘，預言俄羅斯帝國時間所剩無幾：

> 我們的國家不公正也不乾淨，但這樣也比暴動、流血和混亂好。社會慢慢地、不情願地變得乾淨點、像樣點，這花了幾世紀的時間。一場革命就會將它拉回恐怖伊凡(Иван Грозный)時代。(Акунин 1999: 42)

有部份人士認為 1917 年的革命是俄國史上一個悲慘事件，阿庫寧的作品完全符合他們的想法，小說中不僅表達上述看法，並將此一社會意見具體化為藝術創作。

《諜影圍城》中最後土耳其間諜安瓦爾形跡敗露，仍奮戰到最後一刻，在身分遭拆穿後，挾持瓦莉雅躲進銀行的保險庫裡，趁著「拖延時間」的空檔，安瓦爾向瓦莉雅宣揚自己的理念：

> 我是個在生命中選擇了一條非常艱困道路的人……我不是在革命，而是在進步中看見生路。只不過，進步應當被引導到正確的方向，需要人推它一把……我們得協助理智與寬容

[8] 關於契哈爾契許維里選擇以阿庫寧為筆名的說法有二，一是向十九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1814-1876)致敬，所以取名 Борис Акунин (Б. Акунин)，也有人認為 акунин 來自日文音譯，意思是「惡人」。

airiti

> 的力量取得上風，否則在不久的將來，等待這片土地的將是沈重又毫無價值的災變……〔理智與寬容在〕某些國家，在那裡，人們一點一滴學習尊重自己和他人，靠著信念，而不是倚賴槍桿獲得勝利，他們幫助弱者，容忍異己……當然，我並沒有理想化現實……世界便應該依循那條道路前進，否則人類將會被淹沒在混亂與暴政的漩渦裡。（阿庫寧 2013b: 278-280）

安瓦爾認為俄羅斯帝國「目前形成對文明最大的危害，因為它……擁有眾多沒受教育的人口，還有一部遲緩又具侵略性的國家機器」(280)，因此土耳其間諜不惜殺害幾個人來執行自己的計畫，甚至「有意識地打算犧牲奧斯曼政府，只為了讓俄國這股威脅遠離人類」(281)。儘管手段不可取，但其情可憫，因此作者為他安排獨自在保險庫中舉槍自盡的下場，免於投降的羞辱。戰爭結束後簽訂協定，應該享受勝利喜悅的方多林卻感到被擊敗：「協定簡直太……太好了……歐洲不會承認的。安瓦爾的開局走……走得太好了，我輸了」(292)，正義的一方贏得勝利卻覺得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而有挫敗的失落感，儘管壞人最終未能得逞，作者卻表彰其勇氣及鑑別力，提出對所謂善良與罪惡的質疑。

四、以古諷今

隨著蘇聯解體，過去蘇維埃烏托邦夢想破滅，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出現國家認同危機。學者哈姬指出，1990 年代中期俄國出現兩股懷舊風，一是理想化年少青春時充滿希望、以國力為傲的蘇聯生活，因此《老歌音樂會》(*Старые песни о главном*)、電視節目《老公寓》(*Старая квартира*)、《偉大的父母》(*Большие родители*)等節目造成轟動。另一風潮則為歌頌革命前的俄羅斯及國家傳統的道德與宗教價值觀——面對當前悲慘的經濟政治環境，渴望在「失去的俄羅斯」中找到心靈慰藉。米哈爾科夫(Никита Михалков, 1945-)的電影《西伯利亞的理髮師》(*Сибирский цирюльник*)、尤澤福維奇(Леонид Юзефович, 1947-)的《神探普齊林》(*Сыщик Путилин*)及阿庫寧的方多林系列等偵探小說正是這種懷舊現象的反映(Khagi 2005)。方多林的冒險之旅從 1876 年的《冬日女王》

airiti

開始，到 1905 年的事件《鑽石馬車》為止[9]——這段時間正是後蘇聯人民嚮往的黃金時代。俄國評論家金斯基(Олег Кинский)認為後蘇聯時期大眾對帝國俄羅斯看法不同以往：「現在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君主政權只是穩固、公正並保障人民生活富足的政權，也就是格瓦汝辛(Станислав Говорухин, 1936-)的電影《我們失去的俄羅斯》(*Россия, которую мы потеряли*)與傳播類似見解的電視節目、書籍、報章雜誌所形塑的理想化形象。對許多人而言，君主制度的概念已喪失政治現實性，歷史政治意義幾乎蕩然無存，只剩下道德（「人的」、「高尚的」）與美學（「美的」）表徵」(Кинский 2000)。

方多林系列故事橫跨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發動改革後的統治晚期到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在位期間最後的太平歲月，尤其亞歷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在位期間戰爭少，社會相對和平穩定繁榮，是俄羅斯和歐洲在文化和經濟上最為接近的時期，可謂美好帝俄的暮年，尼古拉二世繼位後發生重大社會動亂，二十世紀初腐朽的羅曼諾夫王朝終於結束，因此這段時期是懷舊的理想素材。俄羅斯評論家特洛斐門科夫(Михаил Трофименков)認為以十九世紀末做為故事背景是因為這段期間主要為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政局長期穩定，堪稱俄羅斯的維多利亞時期，但在牢不可破的傳統壓抑下形成新的道德，出現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Трофименков 2000)。

此外，對比亞歷山大二世與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與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可以發現許多相似之處：1861 年廢除農奴制度對國家經濟及心理產生的影響，無異於 1992-93 年取消物價控制和私有化帶來的衝擊；廢止農奴制後，所有農奴獲得人身自由，再加上取消對報章雜誌出版前的檢查，造成十九世紀末百家爭鳴現象，與戈巴契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 1931-)開放改革後引起自由革命相仿；1881 年亞歷山大二世遭暗殺，政局回歸專治威權，與葉爾欽(Борис Ельцин, 1931-2007)政權轉移普丁(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1952-)後情形相去無幾；農奴制度的廢除帶動其他革命性改革，教育普及與新知識份子興起、資本主義經濟與工業革命的急速發展、市場化的農業經濟，尤其隨著享特權的舊貴族消失與新誕生的粗俗暴發戶炫富，和解體後取代蘇聯時期的特權階級，新俄羅斯人出入昂

[9] 2009 及 2012 年阿庫寧又陸續出版新作《世界即劇場》(*Весь мир театр*)與《黑色城市》(*Чёрный город*)，雖同為方多林系列，故事背景不在本文探討之列。

airiti

貴精品店、高級餐廳與健身房，新舊權貴此消彼長的情形也有異曲同工之妙(Aron 2004: 150)。

總之，十九世紀末改革後的俄羅斯是悲慘、貪污、社會不公的年代，就像英國後維多利亞時期般出現許多腐敗、墮落到不得不加以掩蓋的情況，《阿基里斯之死》中將軍死在妓女的床上，《加冕典禮》中皇室家族的小孩遭到綁架等醜聞，最後導致方多林對公部門心灰意冷，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最後的羅曼諾夫王朝走向滅亡(Трофименков 2000)。系列故事中諸多情景不禁讓人想起二十世紀末俄羅斯社會的現況——專斷的莫斯科市長、老鼠會式的金融詐欺案件、同性戀俱樂部……學者芭拉邦便直指阿庫寧作品中所描述革命前的俄羅斯投射出俄國的現況，阿庫寧小說中的貪污、賣淫、歧視猶太人——《冬日女王》中大學生阿赫特爾采夫遭刺殺身亡，「莫斯科一位八等文官……將案情導向神秘的猶太組織、猶太長老會議……如果發生了什麼災難，原因不明的話——大家馬上就會聯想到猶太人」（阿庫寧 2013a: 91）、階級差異、違反規範的性行為（同性戀）及車臣問題（種族歧視）等問題同樣發生在現今俄羅斯社會(Baraban 2004: 403-404)。

《加冕典禮》中正當加冕慶典熱鬧進行的時候，皇室幼童遭綁遇害成為王朝注定滅亡的標誌(Трофименков 2000)。透過調查撕票綁架案件進行社會批判，揭露體面的皇室背後種種令人不堪的內情：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哀悼的不是年幼姪子之死，而是失去英國男性戀人；皇后身著喪服，其實暗自高興拿回預定當作贖金的珠寶；甚至在確知幼童已喪生時，沙皇說：「可憐的米卡成了凶狠卑鄙殺人兇手的羔羊……我們救不了他，但是挽回了羅曼諾夫家族的光榮與名聲，可怕的事故沒有被大肆宣揚，這是最重要的」(Акунин 2000: 130)，凡此種種可以看出皇室家族自私的一面。皇室無法理解思想獨立、人權對俄羅斯發展的重要性，導致「霍登慘案」、日俄戰爭失敗與俄國革命接連發生，不了解民心向背的沙皇家族終於邁向滅亡。方多林系列呈現的十九世紀末俄羅斯並非富足的穩定社會，雖然與經濟、社會動盪的後蘇聯時期一樣有恐怖主義、種族歧視、種族衝突、跨國犯罪組織等相同問題，面對未來，阿庫寧作品中的人物並不迷惘、擔心無法發現真正的俄羅斯。藉著昔今對照，作家提醒當代俄國人不該悲觀，應積極尋找克服困境的出路。

airiti

五、結論

長期以來俄羅斯的大眾文學並不受重視，甚至遭到文學批評家的鄙視。俄羅斯歷史學者盧里耶(Лев Лурье)對 1990 年代末盛行的偵探小說有所詮釋：「不同於英國經典文學，我們的文學不知道偵探小說〔為何〕……從拉季雪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 1749-1802)到索忍尼辛(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1918-2008)的俄羅斯作家都歌頌自由、呼籲同情遭社會排擠的人……不必找尋罪犯：他們（罪犯）是國家、社會制度、主導的意識形態。文學不是輕鬆讀物，引人入勝被視為低劣的標誌、國家體制的敵人及保護者」(Лурье 2000)。

阿庫寧的文學商業方案是俄國文化的首創，挑戰高雅與低俗文學分界而出現的高品質通俗小說。作者坦言「喜歡輕鬆地描寫嚴肅的事」，認為「當作家在一個國家是重要人物時，意味著社會不太順遂」(Афансьева 2002)，因此不僅挑戰一向文以載道的俄羅斯文學傳統，將俄羅斯長久以來受尊敬的文學轉變為娛樂，更以嬉戲、撫慰的方式在小說中杜撰歷史，把歷史當成藝術創作的素材，創造參與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事件的人物——方多林。阿庫寧的作品不說教，只呈現不同人物的視野，將故事背景設定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供讀者自由思考，一方面以懷舊為主題展現復古價值，迎合當前的懷舊情結及讀者對輕鬆小說的偏好，另一方面作品同時滿足尋求刺激的大眾與迷戀後現代互文遊戲的文學愛好者(Khagi 2005)。

與米哈爾科夫的《西伯利亞的理髮師》美化沙皇時期的軍隊組織、東正教教堂、君主政體與人民有所不同，阿庫寧筆下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並非黃金歲月，而是悲涼、腐敗、社會不公的年代，昔日所謂太平盛世的帝俄不過是另一個烏托邦。阿庫寧書中呈現的俄羅斯帝國與今日俄國相似——有同樣的問題，也有類似的希望；所以當代俄國人要走出困境並非仰賴少數人的功績，而是需要多數人的努力——勤奮、誠實、守法、不收賄、肯冒險、有創造力，更重要的是個人對國家盡責——就像方多林一樣。

airiti

引用書目

本文引用與摘譯之阿庫寧作品俄文原文取自：
〈http://book-online.com.ua/author.php?author=17〉. 04 Oct. 2016
Акунин, Борис. Алмазная колесница.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2003.
---. Коронация, или Последний из романов.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2000.
---. Левиафан.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1998a.
---. Любовница смерти.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2001.
---.. Смерть Ахиллеса.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1998b.
---. Статский советник.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1999.

鮑里斯・阿庫寧，丘光譯。《冬日女王：莫斯科左輪槍自殺事件》。台北：櫻桃園文化，2013a。

鮑里斯・阿庫寧，丘光譯。《諜影圍城：土耳其戰地迷情事件》。台北：櫻桃園文化，2013b。

Aron, Leon. “A Champion for the Bourgeoisie: Reinventing Virtue and Citizenship in Boris Akunin’s Novels.” *The National Interest*, 75 (Spring 2004): 149-157.

Baer, Brian James & Korchagina, Nadezhda. “Akunin’s Secret and Fandorin’s Luck.” In Goscilo, Helena & Strukov, Vlad, ed. *Celebrity and Glamour in Contemporary Rus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Baraban, Elena. “A Country Resembling Russia: The Use of History in Boris Akunin’s Detective Novels.”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48.3 (2004): 396-420.

Gresta, Eugenia. “From Moscow to London and Return: Some Perspectives on Boris Akunin’s *Erast Fandorin Series*.” *Toronto Slavic Quarterly*, 55 (Winter 2016): 1-8.

Khagi, Sofya. “Boris Akunin and Retro Modein Contemporary Russian Culture.” *Toronto Slavic Quarterly*, 13 (2005). <http://sites.utoronto.ca/tsq/13/khagi13.shtml>

Komarova, Olga. “Crime Does Pay: The Popularity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Detective Stories.”, 2003.

airiti

<http://munin.uit.no/bitstream/handle/10037/640/article.pdf?sequence=1>

Norris, Stephen. *Blockbuster History in the New Russia: Movies, Memory, and Patriot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Olcott, Anthony. *The Detective and the Russian Way of Crim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Rees, Jasper. "The Masked Man." *Telegraph*. 19 Apr. 2004.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3615639/The-masked-man.html>

Sobolev, Olga. "Boris Akunin and the Rise of the Russian Detective Genre." *Australi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18.1-2 (2004): 63-85.

Vishevsky, Anatoly. "Answers to Eternal Questions in Soft Covers: Post-Soviet Detective Stories."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45 (2001): 733-739.

Wellek, Rene & Warren, Austi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6.

Акунин, Борис. "Я не писатель, я беллетрист." *АиФ Суббота-воскресенье*, 37 (2001). 11 Sep. 2001. <http://www.aif.ru/archive/1724205>

Афансьева, Елена. "Григорий Чхартишвили: в прошлом святой мог быть злодеем."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01 апреля, 2002.

Данилкин, Лев.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в кн.: Б. Акунин, *Особые поручения*.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2000.

Дашев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Григорий Чхартишвили: новое имя тождественно обновлению сути." *Коммерсант*, 21 декабря, 2007. <http://www.kommersant.ru/doc/837630>.

Кинский,Олег. "Романовы, которых мы потеряли: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идея на XXII ММКФ."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6.14(2000). <http://magazines.russ.ru/nz/2000/6/kinsk.html>.

Козорог, Ольга. "'Золотой век' масс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чёба*, 4 (2003).

Комарова, Ольга. "Новый старый русский.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Б. Акунина." *Poljarnyjvestnik*, 4 (2001).

Лоб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Истор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Б. Акунина." *Вестник Вя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0 (2014).

airiti

<http://www.twirpx.com/file/1841054/grant/>..

Лугарич, Даниэла. “Перенос в загадке/загадка переноса (о ‘новых детективах’ Б. Акунина).” *Russian Literature*, 69.1 (2011).

Лурье Лев. “Борис Акунин как учитель истории.” *Эксперт Серверо-Запад*, 8. 15 (2000). <http://expert.ru/northwest/2000/08/08no-akunin_53821/>.

Мурзина, Марина. “Борис Акунин начал сочинять, чтобы развлечь жену.”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44.1045 (2000).

Трофимов, Михаил. “Дело Акунина.” *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4 (2001).

Циплаков, Георгий. “Зло, возникающее в дороге, и дао Эраста Фандорина.” *Новый мир*, 11 (2001).

Черняк, Мария.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2007.